

略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经验

武 力 刘明杰

内容提要:新中国工业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的历史,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内外环境、任务和责任。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二是1978—2012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是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工业发展最紧迫的任务分别是保障国家安全、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新中国工业发展史显示出五个特点:一是“赶超”型,始终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二是工业规模扩张和内部结构升级同时推进;三是政府在工业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变化影响显著;五是始终重视区域布局 and 均衡发展。新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如下历史经验:一是离不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能动摇;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四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五是对外开放必不可少。

关键词:新中国 工业发展 历史 特点 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77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人民温饱远没有解决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历史奇迹。其中,以工业高速发展推动的工业化究竟是怎样实现的,有哪些特点和经验,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来说,都值得深入探讨。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通过学习历史、总结经验,是提高正确认识世界能力、增强改造世界动力不可或缺的方法。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发展(1949—1978年)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奇迹。在一个有5.4亿人口、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大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以及一批重要交通运输线和大型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科学技术取得可喜成果,在“两弹一星”以及核潜艇、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刘明杰,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保定,071002。

空间技术等国防科技上取得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这种奇迹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在当时温饱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的贫困条件下,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采取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了实施这个战略,又实行了能够既保障高积累又保证社会稳定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这个历史时期,虽然以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稳步前进的综合平衡建设方针,但是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个建设方针并没有完全落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陷入了轻重工业发展失衡、积累与消费关系偏差、城市就业困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多的困境。总之,新中国在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由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保障了国家安全,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采取举国体制推进现代工业,尤其是新型工业发展。1949年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国家立即组织开展了以“156项”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工程建设、扫盲工作。这些大规模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这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性建设和从零到一的先进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投入,虽然短期没有产生相应的、即时的经济收益,但为后期国家工业化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时期进行的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和国内694个限额以上的项目为重点的建设,使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发展基础。这些项目涉及能源、材料、机械制造、国防武器装备,以及纺织、造纸、医药、食品等轻工业企业,中国从此拥有了火车头、汽车、拖拉机、坦克、重炮、飞机制造工业,以及电子、核工业等先进产业。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威胁。在此复杂的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以“要准备打仗”为指导思想,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运动。这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始于1964年,至1980年基本结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68亿元,共建设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①“三线”建设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工业发展进程中都是罕见的壮举,不仅形成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也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它改善了中国工业生产力,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布局,并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第二,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妄想颠覆人民政权的企图,中国周边的战争威胁并未消失,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加快国防工业建设

^① 张国宝:《三线建设优化我国生产力布局》,《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28期。

的必由之路,而旧中国遗留的现代工业中,重工业又是薄弱环节和短板,直接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独立的需要,也是补上经济发展短板的需要。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清楚地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要来欺侮我们的。”“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也不能发展:在广大的国土上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火车头不能自制,钢轨也大部分从国外输入;汽车公路通车的在解放前只有七万五千多公里,货运客运汽车为数很少,……几乎没有远洋的运输;完全没有自己的航空业。”^①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因此,在国家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决定一切的形势下,工业发展首先要贯彻国家安全和政治需要,即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第三,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人口众多、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落后农业大国,而且在国际上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发展工业的资金不得不主要从农业提取,正如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③这也是许多尚未实现工业化、主要靠内部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1952年,中国的GDP仅为人民币679亿元,人均119元;全国财政收入179亿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08亿美元。^④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重工业基础也极为薄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国家安全的软肋。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将其上升为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战略后,即开始实行高积累政策,如刘少奇所说的“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⑤1949年的中国工业处在近乎于无的状况。1953—1957年实施了“一五”计划,按照“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706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③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④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9、19、26、6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页。

会主义改造,以支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

自1958年开始,全国逐步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农业集体化实行高积累,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通过实行农业集体经营,农业无条件地支持工业建设,主要通过统购统销和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将农业剩余转为国家发展工业的原始资本。虽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但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先后兴建了一系列工业项目,形成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地得以加强,华北和西北地区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全国基本建立起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据1979年统计,全国工业企业数量达到35.5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0.45万个,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多亿元,相当于旧中国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①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为此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

第四,技术引进与独立研发相结合的政策。1949年后,中国利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关系,立即开始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技术引进,其高潮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和“二五”计划时期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可惜这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因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而中止。此后,中国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例如从日本、瑞典、法国引进化纤、汽车等成套设备。这种引进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断。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主动访华,之后,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德国等40余国,纷纷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举打破了西方长期的经济技术封锁,开启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从1972年开始,中国恢复了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73年的“四三方案”,它是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在1973年开始的3—5年间,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51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过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发展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突破了“贫困性陷阱”。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初步建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与较为强大的国防工业,为大国的独立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内涵日益复杂和外延不断扩大,其弊端也逐步凸显;计划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灵活性,单一公有制导致微观激励不足,这些都困扰着中国工业的全面发展。“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让中国工业发展波动剧烈。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工业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迫切需要

^① 有林、赵少平、王梦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原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解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压力巨大。带着对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总之,这个时期呈现出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许多工业部门实现了零的突破,既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高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专业队伍。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发展(1978—1992年)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①

20世纪50年代我国选择了苏联创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在极度贫困条件下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保障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导致了经济效益低、轻重工业失衡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城市,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少了49元。在农村,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为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②“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教育倒退,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导致“逆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是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1949年以来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四是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趋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1977—1978年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破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② 曾培炎主编:《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897—898页。

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要加快生产力发展、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然要改革高度集中、束缚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改革率先推行。这种改革自然要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上下一致、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改革动力;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带来的外贸增长和外资进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三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这个阶段的工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呈现出波动性的快速增长,形成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尤其是轻工业和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成为亮点,大大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消费品的供给。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一是国营企业改革与农村同步,“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由试点推向全国,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二是农村改革和农业大发展推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是对外开放和积极引进外资促动三资企业方兴未艾,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活力四射;四是城市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快速成长。与此同时,工业发展又具有明显的波动性,轻工业发展大大快于重工业。这一切都缘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短缺”,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饥渴症”和“供给约束”,而轻工业的大发展,一方面是对前30年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补课”,具有极为强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投资门槛低、资金回收快。

三、深化改革开放对工业化的快速推进(1992—2002年)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或者说市场化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确存在巨大风险。中国怎样继续进行改革,怎样发展非公经济,怎样继续对外开放,都成为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没有真正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又集中在如何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而其中分歧最大并与实际关系密切的又是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瓶颈,不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针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焦点问题,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他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即二者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①邓小平的以上论述,被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接受。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时期工业发展环境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二是对外开放和“两个利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通过艰苦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个重大突破为中国工业大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工业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经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不同所有制领域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物质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到1997年前后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结束了“短缺经济”和困扰中国工业发展几十年的“供给约束”。所有制领域出现的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的格局,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而且也使宏观经济调控发生了重大变化。

另外,由于人均收入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也开始升级,即由衣食为主转为住行为主,房地产业、汽车工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道路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的工业发展开始进入“重工业化”阶段。这些都为中国工业的再次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这一时期,伴随着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凸显。一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逐渐凸显,为此,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二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实行转型升级面临困境,在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的同时,在“抓大放小”思想指导下,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到2000年末,实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三是产业升级中蕴藏的不确定性及投入大、成本高等特点,促使资本开始向金融领域和房地产市场聚集。四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显现,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工作为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都有待提高和改善。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工业发展(2002—2012年)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勾画了宏伟蓝图。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疫情的暴发,暴露出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在长期实施赶超战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后,积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中国加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世贸组织后提供的国际市场更加广阔。这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国际环境的新变化,都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基于“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①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内涵。^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长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国,中国的水泥、铁矿石、氧化铝和铜分别占当年世界消耗总量的近50%、35%、20%。^③为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大量消耗资源的弊端,中共十六大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决策,决心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求。按照这个新要求,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提高质量和效益,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人民生活、社会建设、改革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方向和重点。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事业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需要依靠进口,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要求加快科技改革和发展,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同年2月,国

①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38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③ 《“十五”时期工业发展状况》(2006年3月20日),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fx/15cj/202303/t20230301_1920483.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发展目标。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在创新战略推动下,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加,重要学科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超级计算机等实现重大突破。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创造了7062米的下潜纪录,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突破900公斤,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神舟系列飞船实现了发射、空间出舱活动以及空间科学试验等重大突破。到201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子信息制造业大国,计算机、移动电话、电视机等电子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宽带通信网络,互联网网民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阶段,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矛盾与冲突,“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入后期,中国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年9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2—2012年,是我国城镇化最快的时期,城镇化率由2002年的39.1%提高到2012年的52.6%,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中,加快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不变的主题,在抓住战略机遇期以加快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02年我国GDP总量为10.2万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则达到51.9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同期财政收入则由18914亿元增加到11.7万亿元,增长了5倍多。^①在此期间,中国工业借助国内消费升级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也发展迅速,工业增加值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4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2002年的4593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99860亿元,增长了3.35倍,从2010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①这是新中国60多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创造了世界大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奇迹。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大、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工业化)、体制转型(市场化)、社会转型(城市化)三重叠加的急剧变动,也使得一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集中凸显出来。其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最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升至0.479,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逐渐回落,到2012年为0.474。^②这也导致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始终难以真正形成,经济增长还是不得不主要靠投资拉动,其中“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对外贸易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五、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2012年至今)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实行着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此经济运行长期属于“供给约束性”。1997年首次形成“买方市场”后,虽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基础设施补课的要求,以及人民消费由衣食温饱型向住行富裕型升级,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提供的巨大外部需求空间,使得2002—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重工业化的特征,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概念,中国在2012年前后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一是2012年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下降至10.1%,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4.6%,接近第二产业的45.3%;二是沿海地区制造业出现了“民工荒”,农业可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成;三是传统的工业部门普遍出现产能过剩;四是经济增长速度也由2011年的9.5%降至2012年的7.8%。^③因此,以外延型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这也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根本原因。

以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经济发展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4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② 《0.47—0.49 统计局首发基尼系数略高于世行数据》(2013年1月19日),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301/19/t20130119_17044823.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说,中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种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一五”计划开启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国民经济腾飞的高速发展阶段,那么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则开启了国民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是中国经济由以总量扩张为主的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转向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工业化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那种赶超型的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红利”开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升级所导致的传统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或低速。中国经济经过长达30多年的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从发展的波浪式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另外,世界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开始进入增长缓慢的深度调整期,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必然要受其影响。因此,201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11年的9.5%降至7.8%,到2015年降至6.9%,2025年进一步降至5.0%。^①中国经济已经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回答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干什么的问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成为第一大产业,2025年其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7.7%,比2012年提高了13.1个百分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与日俱增。^②“中国制造2025”加快实施,制造业加速迈向中高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5.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2月29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899041.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融合,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2025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36.8%和17.1%,比2012年分别提高8.6和7.7个百分点。^①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2016—2021年年均增长约9.6%,均快于同期GDP年均增速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科技和工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正在从过去长期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环境资源的约束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都更加凸显出科技创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③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中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明确了战略任务和战略保障措施。随着近几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中国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上不断取得突破。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创新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研发投入快速增加。202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39262亿元,是2012年1287.6亿元的30.5倍。^④从2013年开始,中国研发经费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十四五”时期,中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世界第一。^⑤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② 据国家统计局于2015—2021年陆续公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计算所得,2022—2025年的国家统计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不再公布相关数据。

③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6年8月10日。

⑤ 吴月辉、李君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人民日报》2026年4月21日,第1版。

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其中4700多年是处于农业社会,并在此期间创造出领先世界的手工业。但是随着18世纪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而中国在这场文明的转型过程中落后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了奋起直追,仅用了7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发达国家用2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总结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的发展、近代工业化的失败,特别是1949年后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农业文明时代领先地位成功转型为工业文明时代领先地位的大国,同时也是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最匮乏的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具有明显的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特点。由于中国是在落后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有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为保证国家安全和避免被开除“球籍”,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能够加快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加速发展,为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与较为强大的国防工业,但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尤其是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给了中国政府很大的赶超压力,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共识。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人口红利得到释放,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得以凸显;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的优势也得到发挥。为推动工业化的较快发展,中央政府还向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放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工业化得到快速推进。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在历史上中国曾经两次因为未能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落后于世界强国的教训下,新时代中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动能转换。经过77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跟跑”逐渐进入“并跑”和“领跑”阶段。

2. 工业规模扩张和内部结构升级同时推进。从世界工业化普遍规律来看,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经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升级;而工业内部则表现出轻工业充分发展之后,再向重工业的升级。中国的产业升级则表现出双重升级的特点:即农业向工业赶超升级的同时,工业内部也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赶超升级。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大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让新中国领导人迫切想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新中国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推动了整个工业化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植根于中国大

国国情,与西方国家立足于市场基础上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之上推进的,而且重工业依旧在中国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1998年之后,中国重化工业重启成为刺激工业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双重升级的特征也让中国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2012年以来,随着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及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由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

3. 政府在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社会手工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经济规模、统一市场和官营手工业平台。但手工业也随着王朝的兴衰更替而形成了周期性的兴衰。近代一百多年工业化的失败,也是由于政府不但不能为工业发展助一臂之力,甚至不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即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并且由“看不见的手”变成“掠夺之手”。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具备了动员能力极为强大的政府这个优势,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环境严峻,国家安全问题突出,同时重工业非常薄弱、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为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强大政府推动下,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国防尖端工业的建立保障了国家安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从而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步伐。1997年告别经济短缺后,政府成为推动重化工业重启的重要力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确定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宏观方面的各种规划治理、微观上的公有制为主体,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仍然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推进“政府失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高水平市场体系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4. 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变化对工业发展影响显著。1949年后,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让中国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中印、中苏边境摩擦更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的紧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化的重点。“一五”时期苏联援助的“156项”中军事工业占将近1/3,“三线建设”更将战备推到了高潮。中国在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上,短期内就取得了“两弹一星一艇”的成就。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国防建设,让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中国要快速工业化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利用,离不开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

题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开始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充分发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成本的优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及时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了工业的高速发展。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仍然对国内的工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5. 始终重视区域合理布局 and 均衡发展。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区域之间自然地理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同时大多数时间又是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近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工业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位居内地,发展较慢。其中,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区域均衡发展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还涉及大国国家安全、民族团结。1949年后,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合理布局的需要,在1949—1978年,实行了工业内部的非均衡发展和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在区域工业布局方面,则实行均衡发展,加大了对中西部投资,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使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得到缓解。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改变过去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行“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下的均衡发展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扩大开放和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采取了工业内部的均衡发展和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较快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扩大内需、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以及边疆的稳定需要,中国再次采取了区域之间均衡发展战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6. 实现充分就业与突破人均资源不足的瓶颈是中国工业化的重点与难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长期受到抑制,大量劳动力被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滞留在农村,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逐步放开对城市私营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有力的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包产到户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由于我国产业链长期被锁定在中低端,导致“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2012年以来,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普通劳动力成本上升恐怕是一个长期趋势,给中国工业中低端环节原有的“成本优势”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推进在带来就业的新形态、新业态的同时,在制造业领域也出现了智能化对人工的替代。因此,“稳就业”仍将成为党和政府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政策。

七、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根据厚今薄古的历史研究原则和中国从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大国的

普遍规律和特殊性,我们认为需要对截至2026年的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对内发挥历史的教科书作用,对外可以讲好中国故事。纵观新中国77年工业发展历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从整体来看,近代一百多年里,从清王朝到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都没有起到推进作用,反而成为障碍和“掠夺之手”,即使国家经营的以“机船路矿”为代表的重工业也非常失败。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后发大国在亡国的威胁下不得不实行的追赶型发展,即直接发展当时国外先进的国防工业所依赖的重工业,而这种投资大、周期长、人才要求高的产业,带有嵌入式独立发展的性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的支持甚至直接兴办,德国、日本等后发的帝国主义列强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因此,要实现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跨越式工业化,前提就是必须拥有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不仅出现严重腐败,而且其国家能力也十分有限。这导致他们对内难以很好整合资源,推动工业化;对外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环境。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具有高效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集中社会主义大国力量,打破“贫困性陷阱”,克服了人均资源、资本不足以及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制约,在工业薄弱环节,国防工业等领域取得了突破。长期执政地位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对工业化进行长期、整体规划,并且针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环境对工业化道路进行调整。从制定优先重工业发展战略,到改革之后形成的产业均衡发展,再到内需不足条件下通过刺激内需、加入WTO推动重工业重启,再到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大国工业化的目标下,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克服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推动工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动态调整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等关系,积极解决工业化中的不协调问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工业的“弯道超车”。

2. 中国工业化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但二者关系又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动态调整,没有固定不变的各自边界。经过1949年以来的工业化探索与实践,中国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际环境,以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灵活运用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既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又相互制约,避免了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在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中国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行了保障国家安全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当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多样性、复杂性不断增加,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市场化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总量不断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更

应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分散决策风险。在工业化进入后期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种动态调整的特征,使得中国工业化道路发挥了政府优势,实现了快于欧美国家的工业化速度。

3. 工业发展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挥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双重优势。历史地看,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然后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转变为单一公有制,这个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受政府行政命令的直接支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三者资本混合的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事实证明,这种所有制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仅使得中国经济充满活力,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种积极因素;而且保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77年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的单一公有制,通过保障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来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误和挫折。经验证明,中国必须在所有制结构和发展方向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①发挥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双重积极性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是简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它还包括落实国家意志、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内容。在中国迈向经济强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应当凭借雄厚的资本与技术在自主创新、“走出去”等重大领域发挥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非公经济面临的竞争压力,使得其灵活性更足、应对市场变化更敏感,接受新事物更积极,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扩大就业、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4.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主动处理好工业化中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中国作为人口多、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个重大命题。中国过去人口多、底子薄,实行“赶超”的资本主要靠自己积累,因此需要“勒紧裤腰带”和艰苦奋斗。因此,新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高积累。尽管如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是高度重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的概念,陈云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看,比较好地解决了工业化中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并消除了整体性贫困。但是,应该看到,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比例和调控手段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唯一的调控者,其目标是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条件下尽可能提高积累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和市场共同成为调控者,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需求也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升级。因此,在工业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一方面是企业(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薪)收入的比重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比重,即税负高低的问题;此外,还有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历史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于强调积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能有效提升,这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比较好地解决好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创造出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时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完成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将实现共同富裕列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并积极稳健地推进。但是,这个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总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平衡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实现国际、国内市场双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

5. 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工业超常规发展。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既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做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中国的工业化从来不是隔绝于世界的,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1949年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尤其是苏联援助的“156项”,推动了中国重工业跨越式的发展,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改善,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仍然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其中以“四三方案”为代表,让中国在化纤、化肥以及电力、轧钢等方面的技术实现较大进步,为我国下一步的国内技术扩散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使中国得以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中国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步伐。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请进来”,而且“走出去”,对外经济交流进入快车道,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抵制“逆全球化”,推进合作共赢,不仅在国际上首倡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也深化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工业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下发展,需要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不断壮大,从而由世界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C

Wu Li, Liu Mingjie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PRC represents a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combines continuity with distinct stages, each characterized by specific domestic and interna-

tional conditions, task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spective generati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PRC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first,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1949 to 1978; second,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ir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2012. During these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the most urgent task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re, respect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ing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C exhibits five distinctive features: first, a “catch-up” approach, where the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catch up with and surpass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wide; second, the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cale expansion and internal structural upgrading; third, the government's consistent role in driv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ourth,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relations; and fifth, the persistent emphasis on regional layout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PRC has yielded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lessons: first, it cannot proceed 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second,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economic components, 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dominant one, must remain unshakable; third, properly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cruc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ourth, it must adhere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fifth,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indispensable.

Keywords: PR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s

(特约编辑: 龚 云)